

1703



老河口文史資料

第1—4輯
(內部刊物)

198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老河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说 明

本刊已经以十六开版油印发行了四辑，市人武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一中等单位，在打字印制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帮助，在此表示致谢！

应读者的要求，本刊从第五辑起改为三十二开版，铅印发行，并将原一、二、三、四辑略作调整后汇集成一册，铅印再版，以利收藏。

目 录

- 第一辑 1、意大利传教士是怎样把武器运进老河口天主教教区的……………艾伯镛（1）
2、我所知道的“范友信汉奸案”
……………温植林（4）
- 第二辑 3、均、光、谷三县民团总指挥余杨珍生平概略
……………郭夫之（8）
4、关于国民党180师师长刘振三的片断回忆
……………张天民（11）
5、蒋经国最后一次召见我们的经过
……………谢正廷（14）
- 第三辑 6、老河口育英、培德中学学生在“五四”运动时期
的一次爱国活动纪实……………沈镜秋（20）
7、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在老河口的活动情况
……………苏 焱（23）
8、韩世乐骗局真相……………闫君石（29）
9、《阵中日报》上的一次论战
10、小资料——“二十一条”
- 第四辑 11、鄂北特区变迁见闻记……………程兴泽（42）
12、郢阳漕汁和“醉月”酒家……………谢正廷（51）
13、老河口宏慈医院……………艾伯镛（54）

意大利传教士

是怎样把武器运进老河口天主教教区的

艾伯 鐸

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春节期间，湖北省天主教三个教区，即鄂东教区（武昌为中心），鄂西教区（宜昌为中心），鄂西北教区（老河口为中心）的主教及重要司铎（神甫）齐集在武昌花园山天主堂开了一次天主教教务会议。会议期间，主教们请湖北省督军王占元和湖北省省长何佩瑒到武昌花园山天主堂举行了座谈、宴会，并照了像。会后，老河口教区主教毕世修（意大利人）在汉口购买了一批物资，雇了一只不大也不小的木船，准备运回老河口天主堂。那时我十三岁，随着父亲在汉川县天主堂居住。我父亲艾宜春在该堂当佣工，主教们在武昌天主堂开会时，他在那里侍候。当时，我父亲要求毕主教把我带回谷城沈家垭入修道院读书，毕主教允许了。（因为我的老家在谷城黄山垭子距沈家垭50里路）。

民国八年正月十三日，我在汉川县乘上毕主教的运货船。船上只有刘先生一人（他是毕主教的服务员，名字忘了）押船，没有别人。听他讲，毕主教已在汉口搭火车到广水，尔后坐轿子经随县、枣阳、襄樊等地回老河口。船走上水虽慢，但很顺利。一路上，我看到其它民船每到一个关卡就要被搜查留难，可是我们的船沿途竟无人过问。我好奇地

问刘先生是何原因，他说：“你没看到我们的船后挂有一面外国旗子吗？那是意大利旗子。”他还说在汉口动身时，因主教不在船上，害怕路上麻烦，（因他押船，当然知道船上装载的是些什么东西）就向主教谈了，主教对他说：“你甭害怕，我已向王督军要求过，叫他下个手令给从汉口到河口沿途军警关卡，如果看到挂有意大利旗子的船就放行，不许盘问。船过襄樊，也不知到了什么地方，（因当时我对地名不熟悉）后面上来了十几只大木船，是队伍在押送，由抓来的民夫拉纤。这时，船太公很害怕，跟刘先生说：“后面队伍船来了怎么办？”刘答：“别怕，不会有事。”果然，一大帮木船依次而过，船上的队伍，也没盘问我们。

船抵老河口，刘先生上岸到天主堂向毕主教报告。（毕早已回到老河口）主教命当家神甫马嘉来（意大利人）到新码头城门与看守城门的士兵交涉之后，遂由大堂医院派来工人运货。我同刘先生把较小而重要的物件送到医院。这时，我看到船仓里有装葡萄酒的大木桶，还有大小木箱，外面写着“老河口天主堂宏慈医院收”，“内装医药器械”字样，另有铁桶、麻包等。在医院启封时，小木箱里面装的是医药器械。大木箱里面装的是枪支，其中有快枪、盒子炮、双筒鸟枪等。见到这些，他们立即把箱子盖上，又去开别的箱子。

起货前，船太公想：这面旗子真有用，就一再要求刘先生把那面外国旗子送给他，或者卖给他，刘说：“你就是出一千块钱也买不来。”

我到老河口天主堂后，就在该处教堂办的道范学校读了半年书，不时看到外国教士拿着双筒鸟枪到山上打猎。

一九二七年，我在老河口教堂和沈家垭教堂分别看到外

国教士持有快枪和盒子炮。

至此，人们不禁要问：传教士要武器干甚么？意大利人毕世修悄悄往老河口教区运送武器目的何在？这里，让我们回想一下曾经发生在谷城沈家垭教堂的两件事。一九二七年，北伐革命军浴血奋战，攻克武汉，消息传来，外国主教如丧考妣，並蛊惑教徒举行了一次武装示威游行，又是鸣枪，又是呐喊，甚至燃起火把，顷刻间，明山净水，暗淡无光。一个纯正的天主教被弄得如此乌烟瘴气。一九四九年，谷城已经解放，可是沈家垭教堂的部分教徒在外国传教士的唆使下，发动了一次反革命武装暴乱。仅此二例，不难看出有些外国传教士悄悄往中国内地运送武器的目的，他们到底是以救人为怀来中国传教，还是包藏祸心，来鱼肉我国人民，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我所知道的范友信汉奸案

温植林

一九四一年秋上的一天，老河口市内突然军警密布，戒备森严，来往行人被轰赶到街道两旁，有的窃窃私议，有的踮脚眺望，转眼之间，平静的市区成了白热的战场。

不一会，从太平街方向传来一阵单调而又凄惨的枪决人犯的军号声。接着，一队荷枪实弹的刑警走了过来，手提式机枪，二十响快慢机大张着机头。刑警队的后面是一辆人力车，车上五花大绑着一个身穿西服，脚穿皮鞋约莫四十上下的男子，他声嘶力竭地一路大喊：“冤枉！冤枉！”有人惊讶地小声说：“这不是惠民医院的范医师吗？”有人赶忙惶恐地拉拉多嘴的人：“兄弟，莫谈国事。”也有些胆大好事的人，一路小跑，紧追行刑大队直到大东门外，听得一声枪响，围拢去的军警看看血泊中的死人，骂几句痛快之后，带着心满意足的神彩归去。这就是抗战时期发生在国民党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所在地——光化县老河口一件轰动全城的范友信汉奸案。

本人曾参与此案的搜查，虽然时隔四十年，但其始末还记忆犹新。

范友信的父亲范正祥是基督教的虔诚教徒，有一手烹调技艺，中西佳肴、红白两案颇为精通。挪威人沙麻牧师既信奉基督，又注重口福，就雇用范正祥为专用厨师。范友信的

母亲手脚麻利，被雇当杂役。基于上因，范正祥全家都居住于福音堂内。范友信虽然出身微贱，但生得五官端正，面色红润，两只眼睛显得格外机灵。因其自幼厮混于洋人之中，弱冠之年就谙熟一口洋话，故而甚为洋人器重，着力培养她专攻西医。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范友信长大成人，干起了贩卖西药的营生。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范友信竟成了老河口屈指可数的富翁，并在中山公园西北角上购买地皮一块，大兴土木，盖起一组中西混合结构的洋房。招牌曰：惠民医院。

惠民医院是一家私立医院，行医看病医术较为高明的只有范友信一人，生意不是很好。但其医疗器械较为完备，许多紧俏贵重的西药，连李宗仁办的平民医院都没有，而惠民医院针、散、丸、片却一应俱全，民办超过了官办，终是件令官府不悦之事。

当时，五战区长官司令李宗仁喜欢骑马、打网球。也不知起始何日，每逢李宗仁在中山公园内专用网球场打球时，就有一位穿着入时，仪态雍雅的青年女子一旁观阵，并主动为其拣球。李见这一女子举止亲昵，风骚动人，也就渐生好感。迨后，这女子借机大展交际手腕，和五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将高参张鹤龄，少将副官处长农之政等有了些暧昧关系。

一九四一年元月，军统组员徐大中住进惠民医院，以治疗肺病为名，奉命进行秘密侦探。大约过了半年，徐大中向军统组报告，说惠民医院防空洞内夜间有收发报机的声音，并说范友信与经常缠在李宗仁、张鹤龄、农之政等高级将领身边的那个女人交往甚密，范还聘该女人作了家庭教师。这

位女子何许人也？据白口区长王启东说：此人名叫刘洁人，外号“红大衣”，又称“红姑娘”，祖籍京山县人氏，其父是钟祥县某医院医生，常与日本人交往。因此，刘洁人遂被日本人选拔到武汉接受特务训练六个月，以后便被派遣到五战区搞特务活动。综上所述，军统组怀疑范友信是汉奸，刘洁人则是范的联络员。于一九四一年七月将二人同时逮捕。

此时，我在第五战区长官司令部宪兵营第四连任上尉连长。七月的一天早晨，宪兵营长廖祖燕命令我选派十名宪兵，亲自带往惠民医院执行搜查任务。接到指令后，我感到关系甚为重大，当即挑选了十名精干的部下，火速赶到惠民医院与军统组长王晓晖带去的人汇合，对惠民医院实施了彻底清查。几经钎扎锹挖，几经锤敲棒砸，结果在楼下搜出现洋400余块，鸦片烟土数两。烟土违禁，现洋值钱，这下搜查的人们象注射了克洛因似的兴奋起来了，又急急忙忙到楼上搜查。结果，宪兵副班长梁隆在一堆破铜烂铁中发现了一根两尺多长的铜丝，军统组长王晓晖认定这就是收发报机的天线。

晚上，我向宪兵营长廖祖燕汇报了执行任务的经过。他对我说：“上午在洋油栈码头已将刘洁人捕获归案。现押中正小学。由你连宪兵看管。”并责成我严加看守。我即刻带上护兵前往中正小学。经过简单询问，刘洁人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她约莫三十上下，适时的打扮，飘逸的风度，一双眼睛秋波横动，楚楚动人，但此刻流露出的却是一片焦虑、惶恐与悲怜。第二天，我根据上司命令，将刘洁人移交给了军统组。

不久，战区军法处与军统组联合审理了范友信汉奸案。

虽说没有搜出发报机，但有“红大衣”的供词，另加一截铜丝，认为人证、物证俱全，遂判处范友信死刑，立即执行，惠民医院全部财产没收充公，“以资抗战”。至于“红大衣”，听说结案前后与军统徐志道很厮混了一段时间，解送房县后，如何处置就不清楚了。以后，军统组长王晓晖又对我说，这一案是重庆方面授意查办的。真实与否，不得而知。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范友信汉奸案始末，读者若能从中悟出一点什么，则幸甚矣。

均、光、谷三县民团总指挥

余锡珍生平概略

郭夫之

余锡珍湖北麻城县人，粗通文字。青年时期曾在一家黄州帮开的漆行当学徒。由于流氓成性，吃喝嫖赌无所不沾，数月即被开除出行。余为人狡诈，极善钻营，不久便自筹在老河口南街开了一处生漆店。字号：“永生和”。接着又拉拢商家凑了一些资金开设了一处钱庄。字号：“永生珍”。地址在老河口后街新马路对面。

余一面拉拢各帮商号经理，一面拢络驻军。当时老河口驻军第五师152旅旅长李柱中，（麻城人）余利用同乡关系与之勾结，广施财礼，博得李的欢心，很快就当上了老河口商会副主席。（正主席是黄杰三，不问事）余当了商会副主席之后，恣意骄纵，横征暴敛，每日派出五十多人向摊贩征收杂税，并且以老河口商会的名义大量印制纸币，在老河口市面以及临近几个城镇流通。群众虽然不敢拒用，但还是发生一度发生过拒用商会纸钞的小风波。余锡珍得知消息后，马上以商会名义贴出告示，声称以银元兑换，又派人检查，在余的压力与欺哄下，未两日便风波平息。

余曾设立步枪制造厂，（厂址在洞宾楼内万善寺后院）制造枪械，以扩充实力。（仿汉阳造）创办启明电灯公司，（在老河口原启新街）名兴实业，实则发财。民国十八年，

余锡珍在驻军李柱中旅长的纵恿下，成立了均、光、谷民团总指挥部，自任指挥长。（也呼民团司令或“剿匪”司令。）其实余锡珍是个不学无术的大草包，所以人们说他是“尸位素餐”。余当上了总指挥之后，除原有一妻之外，又买了两个小妾，终日淫乐饮宴。当时国内军阀割据，山高皇帝远，有枪就是草头王，余外勾军阀，内结地头蛇，俨然是鄂北一小霸王也。

余的民团总指挥部下辖三个支队，每个支队有两个团的编制。

光化县为第一支队，支队长程华三，下属两团，一团长王南陔，二团长王槐三。

谷城县为第二支队，支队长张敬舆。（团长名不详）

均县为第三支队，支队长郭欧武。（1946年郭是均县的国大代表）

民国22年，余锡珍率领三个支队全部武装开到房县山区与红军作战。他率领的武装部队到房县山区后，并没有与红军接触，驻了不满一月，即返回老河口。他的部队在房县进行大肆抢掠，仅白木耳一项就达数百斤之多。余还在乡间抢来一个民女，逼做三妾。

余锡珍在他的永生珍钱庄的楼顶上修了平台，作为休息之所。春夏秋三季，每天夜晚，这里汽灯高悬，供其聚赌。余还经常派护兵到妓院迫妓女前来弹唱作乐。赌后大张筵席，开怀畅饮，直至酩酊大醉。围观群众虽然气愤，但又无可奈何，只好背后骂他“犹如隋炀帝杨广”，以此解恨。

余锡珍身为民团总指挥，妻妾满堂，终日狐朋狗友满座，其耗费之巨不言而喻。余的钱财实乃民脂民膏，其勒索

花样之多不胜枚举。比如写一张借条向大行号借款，“今借银元两千，以应急需。余锡珍。”大行号见条后，虽然明知这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但迫于势力只得凑齐交到。殷实行号无一幸免。

余锡珍是三县民团总指挥，论地位在县长之上，加之其入骄横，所以各县县长见余都战战兢兢。一次，光化县长黄金城，因为机关经费欠缺，不敢开支，来找他商谈挪借现金一千元。他不等说完就开口大骂：“娘卖×的！哪有钱借给你们开支？”黄县长忍气吞声急忙告辞，另打主意。群众看到余锡珍欺压人民，愤恨万分，纷纷向省府及专署控告。由于余锡珍抱着李柱中这条粗腿，商民控状，如石投海，故余更加有恃无恐。

民国二十三年，××军长刘茂恩带领部队从西路经过老河口去河南南阳驻扎。老河口各界人士纷纷呈递诉状，要求惩处余锡珍，为民除害。也不知出于何因，刘茂恩责令光化县长黄金城、民团团长王南陔、王槐三，拘捕余锡珍押送南阳待审。

过了不久，光化民团二团长王槐三向群众宣布：余已被处以极刑。并说刑前湖北省政府曾电刘军长，要将余案解省处理。南阳督军署接电后给湖北省回电说：“已于前日处决”，但其中奥秘，外人不得而知。但余锡珍之死，均光谷三县人民均拍手称快。

（根据肖云正等口述整理）

关于国民党180师师长刘振三

的片断回忆

张天民

国民党五战区33集团军180师师长刘振三，（号育如）是河北故城县人。早年是冯玉祥先生的录事。“九一八”事变喜峰口之役时，刘振三还只是一个团长，在这次战役中，他身负重伤，后经冯玉祥先生亲赴北京协和医院重托医治，才得以活命。“七七”芦沟桥事变时，他是29军38师的一个旅长，驻北平廊坊车站，不久升任180师师长。一九三八年日寇大举进攻山东临沂，该师与坂垣师团激战多日，肉搏数次，双方伤亡，都很严重，但到底挫败了坂垣师团的锐气，迫其撤退，给著名的台儿庄大会战奠定了胜利基础。

武汉放弃后，180师由信阳潢川转战襄河西岸，奉命修整，常驻钟祥、宜城、南漳一带。那时，我是师部军需，对师长刘振三的生性略知梗概。刘振三有吸食鸦片嗜好，四个老婆，常伴身侧的是其最钟爱的小老婆，人称四太太。刘专横跋扈，目空一切，全集团军中仅惧总司令张自忠一人，加之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一言逆耳，就怒火冲天，人皆畏之如虎。

有一次，部队从新乡移防武胜关，同车有一军政部官员，其人自亮身份是军风纪视察。在柳林车站下车，脚刚落地他就指责180师军风纪不好。刘师长听了顿时勃然大

怒，当即破口大骂，并指令随从人员开打。随从如狼似虎将军政部大员苦打一顿，可见其性情之骄横。

另一次是总司令张自忠阵亡后，冯治安召集全集团军的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在会场上，刘振三指责副总司令李文田说：“你怎么没有死？”气恨之下，拔出左轮枪直指李文田，幸被冯治安拦阻，才免了一次火併。其性情粗暴对上级亦然，对同级及部下则可想而知。

一九三九年部队驻南漳武镇，刘振三专程赴重庆晋谒冯副委员长述职。回来后，赠送全师军官、佐每人夜光表一块、金星笔一支，上面刻有“师长刘振三赠”字样。同年，全师军官佐一律参加青帮。人手一册海底书。辈数为“念四”。师长为“念三”。（即青帮中的长辈）

在南漳时，刘振三广为联系地方绅士、土劣武装。在其利禄诱惑下，鄂北游击队戴焕章部最后依附刘的麾下。仅一次刘振三就送给戴焕章五百元大洋，并令其招募兵员，够一营给营长职，够一团给团长职。

不久，此举为大洪山红帮大爷刘发贵所知悉，于是慕名而来，刘振三正求之不得，他对刘发贵极尽拢络之能事，用同姓同宗来拉拢这位草莽之辈。刘发贵对此受宠若惊，即刻将自己的红帮大爷位置让给了刘振三。此后，刘振三便称刘发贵为大哥。刘发贵即称刘振三为育如老弟。接着，刘发贵率部归附，暂作180师的一个直属大队。刘发贵即为当然大队长。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消极抗日，千方百计地保存嫡系实力。因此，每次战役与日寇作殊死斗争者，皆为那些尚有民族感的杂牌军。

在随枣大战中，冯系 33 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身负重伤，最后一人还坚守阵地，与敌作殊死战斗。临死前连声大喊：“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

起初，蒋介石对张自忠阵亡一讯疑而不信，恐怕是诈死。遂饬令冯治安将张自忠遗体运送到重庆，视后方才无疑。由此可见蒋对杂牌军疑嫉至深。现在，忠于张自忠的刘振三明目张胆地进行结帮拉派，自然意在扩充势力，免被他人吃掉。在蒋的挟嫌之下，岂能容他任意扩充势力。

不久，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任湖北省主席的陈诚电饬 180 师师长刘振三，务必把刘发贵匪部杀绝，违者以军法论处。陈诚惟恐刘振三徇私抗命，同时电请李宗仁监督执行。刘振三受到双重压力，无可奈何，只好忍痛受命。昔日自恃有冯、张二人宠爱，今日靠山已失，只有惟命是从，苟安一时。这时，他才和参谋长金子烈密谋制定除掉刘发贵的计划。

这天，一阵号响，全师官兵紧急集合，听参谋长金子烈训话。训话完毕，金参谋长对身旁的勤务兵说：“去请示师长还有事没有？”一会，请示人回来报告说：“师长召集全师军官讲话。”闻讯，所有军官（包括刘发贵的亲信在内）立即按指定地点集中，坐等师长到来。这时刘振三的随从走到刘发贵面前轻声说：“师长有请。”刘发贵被蒙在鼓中，毫不介意，相反还引以为荣，高高兴兴地与来者同行往见师长。当他进入师长住的第二道大门内时，大刀已落在他的脖子上面了。

随后，刘振三的随从副官出门暗示，所有刘发贵知己亲信一一受绑。相继对刘发贵士兵进行缴械，集中一起同时枪杀，计一百余人。刘部幸存者仅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事后进行拍照，围观者无不毛骨悚然。

蒋经国最后一次召见我们的经过

谢正廷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蒋介石被迫下野，返居浙江奉化溪口镇老家，继续暗中策划与人民为敌的各种阴谋。蒋经国这时亦随其父住在溪口私邸。他们一面利用美国飞机，登陆艇把抢劫而来的大量黄金、白银、古物、国宝、精密机械、高级汽车，以及蒋氏宗族的细软等，昼夜不停的运到甬江码头，然后惶惶送往台湾，一面又假装镇静，向各路溃败下来的部属打气壮胆，妄图稳住阵脚。

那时，我在国民党国防部第二绥靖总队第二大队第一指挥室任中校指挥员。一九四八年秋，我队由江北撤到江南，担任京沪路镇江至常州一线绥靖工作。年底又奉调浙赣路担任诸暨——金华一线绥靖工作。一九四九年二月我队奉调宁波市，担任保卫宁波机场工作。（宁波至溪口80公里）宁波机场即蒋介石的私人机场。机场上飞机起落频繁。往来者大多是晋见蒋介石的军政要人），我的指挥室设在宁波市江北岸二马路。

一九四九年四月底的一天上午十时许，总队部接到溪口侍从室打来的电话，通知总队校级以上军官下午四时到溪口总裁私邸会议所，听候蒋经国特派员召见。（一九四八年秋，蒋介石企图挽救金融危机，刹住金元券贬值，平息物价一日败涨的浪潮，特派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打虎。在上海，